

心 香

——先父史国衡百年祭

○史际平（1978级精仪）

2012年家有百年祭。

1912年元月先父史国衡出生在湖北随县（1994年升为省直管随州市）的一个小山村洛阳店，距今正是百年。在现代中国的家中好像很难再找到有专门为祖先设立的牌位，本人久居国外，距源远流长的祭祖传统似乎更是渐行渐远。但是在我的心中为父亲立的牌位永远在，并于父亲百年之际在心中为他点燃三柱香。

—

父亲原名史记凡，共有兄弟五人，他本人排行老五。小时候他先在母亲张氏家族开的私塾里念书，自幼的读书同伴是表兄弟张时超。随着科举考试的废除、洋学堂的兴起，1929年他在17岁时有了机会走出山村，来到武昌接受刚刚开始的新式教育。在这里一起读书的有张时超（张从武汉大学参加革命，曾任南昌航空工业学校校长和江西省内第一所工学院——江西工学院院长）。从旧式的四书五经到现代的数理化，尤其是英语，父亲付出的努力只有刻苦和勤奋可以用来形容，更确切地说他下的是笨功夫。父亲日后在提到这一段的学习时经常提到他学英语的经历。在上高中之后英文成了他最头疼的一门功课，



史国衡学长

对此他就是下苦功夫、下笨功夫。经人指点父亲找了一本经典英文读物，硬是背下了其中所有的文章，就这样在短时间内同时提高了英文的阅读和写作水平。自1929年之后的6年间，我想他一定也是用的同一种功夫，顺利完成了新旧教学体制的转换，终于在1935年他23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属11级，1939年毕业。父亲从入清华大学的第一天开始，他的求学、治学到后来留学都是与清华大学密不可分的。根据最近查到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董事会议记录，1943年4月他的恩师费孝通教授在燕京学社支持和资助下，将父亲所著《昆厂劳工》翻译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英文版书名为：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

序，美国哈佛大学霍桑实验室的指导者梅岳教授（Elton Mayo）写了编者按语。该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和发行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意。1945年4月，燕京学社董事会讨论并通过了由吴文藻教授于同年3月写给学社的推荐申请。因此父亲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做研究工作，3年之后，1948年回国，还是回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书，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对父亲命运的改变应该是空前的。他先是短暂兼任校人事室主任，在社会学系停办后开始担任总务长直至1961年转任图书馆馆长。父亲曾多次在私下讲过，从乡下走出来到城里念书，他的父亲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是必需的。他的父亲一生勤俭持家，苦心经营，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对他唯一在外读书的儿子却是尽力支持，尽管有时并不十分的情愿。父亲在武汉念书，每次放假回家临走时的固定一幕是要钱付学费，我的爷爷总是一边给钱一边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啊，但是下次还是照给不误。从父亲的言谈之中我可以感到，他对自己的父亲永远怀有一颗感激之心。土改时，爷爷已经去世了，但是家里的成分是地主。记得在“文革”之中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检讨，其中对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缺乏深刻认识是原因之一。每次提到此事父亲总是讲，他的父亲仅仅是一个土地主而已。那时候我还小，有一次听父亲又提到了此事，我冷不丁插了一句，不论是土地主还是恶霸地主，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现在想起，虽然是童言无忌，但我当时的话一定给父亲在心理上又增加了不少苦涩。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给父母添的

麻烦从未间断。在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家就搬到15公寓。当时刚刚建好楼房，大家都不太愿意进楼房住，所以总务处的干部们以身作则纷纷放弃平房搬入了公寓楼。1966年兴起的“文革”让很多住公寓楼的人来说会有抄家、斗黑帮的记忆。父亲在风暴中也被挂了黑牌，家也被抄，我们的家从此先后搬了5次。1969年我们家又一次被迫搬到了面积更小的9公寓23号，客厅与张典教授家合用。不久姐姐、哥哥离京下乡，父亲去了江西鲤鱼洲。江西鲤鱼洲原本是一个劳改农场所在地，因为有血吸虫，劳改农场迁出。后来知道当时管理清华的军宣队为选址找到南京军区，首选是位于江苏省的洪泽湖边上一处农场。那地方条件较好，距离北京也近。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选择了因为发现小虫疫情而搬迁的江西鲤鱼洲一处劳改农场原址。理由竟然是：选择一个条件艰苦的环境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的军宣队是知道病害的，都尽量不下田。可想而知环境的艰苦，父亲曾经说过收割水稻时有上百斤的担子，他挑起就走。夏天酷热，有些人竟拿着碗在水中吃饭，也因为与水如此频繁地接触，很多人从鲤鱼洲回来即检查出患上血吸虫病，甚至肝硬化等等，父亲回来后体检也发现肝肿大。他在鲤鱼洲劳动生活的细节我了解不多，但是他刚回来时的一件事让我大受刺激。父亲见到我自然要问在学校的情况。那时学习并不重要，可是政治上要求进步却极其敏感。偏偏我那会儿属于“坏”学生，读到快五年级了连个红小兵都没有当上，更何况到高年级已经很少有人不是红小兵了。父亲听了很生气，他要真说我两句也罢，哪怕是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打我两下呢，惟其欲言又止，让我当时的心情只有无地自容四字可以形容。此事虽事隔多年，尤其当我为人父之后，每当回忆起父亲当时那失望、责备、还有无奈的眼神，我总感到有泪在心上。

心中燃起的第一柱香是为了记住我给父亲增添的烦恼。

二

从小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对学习和工作的认真，对同事和朋友的友善，对子女教育的严格。1937年清华大学迁湖南组建长沙临时大学。此后因战火蔓延，学校继续西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其间联大的280余学生在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黄钰生等知名教授的带领下组成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这些热血青年在教授们的带领下于1938年2月19日自长沙出发，经湖南西部，穿过贵州，经云南省东部于同年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24公里（其中乘船125公里，乘车225公里，其余为步行）。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父亲在步行团中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三分队。

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位于昆明，文法学院暂时设在滇南的蒙自县城。该县接近云南省个旧县的锡矿山区。在紧张学习过程中，当父亲得知锡矿工人还处于奴隶式的劳动状态，便自己设法深入到锡矿山区，对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访问和调查。他了解到多数工人都是被诱骗上山的，来后就被限制在矿主的矿区内，进行从早到晚的长时间劳动。矿区内各个路口由武装人员（家丁）

把守，如有人企图逃亡，一经抓获则被带上脚镣劳动。矿工只有主食吃，一般用盐水下饭，最好的是喝点豆浆。在目睹了这一切后，他以第一手的亲身经历运用所学的知识写成了《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这就是他的毕业论文。这篇反映工人悲惨境况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对于西南联大的社会学系的师生关系及教学方法，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在其《天助自助者——忆先师费孝通教授》文章中记述如此：1939年上学期，他（费孝通教授）到西南联大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我选读了这门课，于是便成了他的学生。当时，他长我还不到三岁，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和清华社会学系同学张宗颖、史国衡、张之毅等常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熟悉。他讲课方式自成一格，和现在某些让学生“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抄笔记”的大学教授讲课方式迥然不同，既无教科书，也没有讲稿；用中文，有时也用英文；内容海阔天空，旁征博引。知识面窄而又不习惯于思考的学生，也许听完这门课后印象不深，所获无多。但是，如果你知识面较宽，听课时注意思考，善于捕捉他讲课内容的精华，你就不仅是获得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还能触类旁通，联想到与这门课程有关的一些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使你学术视野开阔，深思遐想，渴望遨游更加宽广而灿烂辉煌的学术殿堂。

父亲于1939年毕业留校做助教，在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了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由于个人的研

究兴趣，他于1941年转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工作，任讲师，又一次来到时任系主任费孝通教授的门下。当时由费孝通先生带领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做研究，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研究群体：“魁阁”。这是《费孝通暮年自述》中对“魁阁”由来的叙述：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么地方去呢？经吴文藻的介绍，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这座破败的三层古庙的外面风景很美，内部却陈旧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墙缝里藏着小虫，叮得人浑身发痒。我们把一层作了厨房，自己开伙；二楼摆上桌子办公；三楼住人。张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等几个人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情绪很高。后来大家都把这里叫作魁阁。

在父亲去世之后，谷苞先生（时任新疆社科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给我姐姐写信致哀，在信中也提到过他和父亲这段共同的经历：从1941年到1944年，我和你爸同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我们的研究室设在当时呈贡县大古城村的魁星阁里，这个魁星阁有三层，下层是厨房和洗脸间，中层是有六张桌子的办公室和图书室，顶上的三层是你爸和我的宿舍，还有一个泥塑的鬼怪一般的魁星给我们作伴。那时没有电灯，夜晚就在菜油灯下读书或写作，虽然生活很苦，但在当时我们并不以为苦，还是很用功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颇有意

义的三年。这三年也确定了以后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六十余年后，潘光旦教授的女儿潘乃谷著书《重归“魁阁”》，她特别强调“魁阁”是打了引号的，并进一步解释“魁阁”并非一时一地，更是代表了一种精神。

父亲如何对待上级我了解很少，但是如何对待下级有一件大约发生于30年前的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杨天民是图书馆的行政人员，他从鲤鱼洲回来之后因为血吸虫病在外休养远离清华，一天他的母亲因为突发病住进了医院。父亲得知后马上联络了清华的司机班，叫了车接杨天民连夜直接去了北医三院。记得事后父亲颇有些意外地讲，事先觉得让清华为不是领导的人远途出车一定会有困难，并猜想也许是因为多年前任职总务长起了些作用。小时候父亲给我解释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想他当时很可能会想到他自己的父母双亲。

印象中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非常关注的，记得小学一次地理考试前的晚上，父亲问我都有哪些应该复习而我还没有准备的。我讲老师要求将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名字记下，由于这项内容不一定会考而且明天考试现准备已经来不及了。父亲马上给我讲了“亡羊补牢”的故事，然后按每个省的简称，押韵地将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名字组成像诗一样的几句。我顺利地将这几句记了下来。这个“亡羊补牢”的故事让我终生受益，多少年后我也将这个故事和其含义在美国讲给我的儿子听。父亲为人忠厚，周围有些同事生活困难，他总是解囊相助。但对于自己的子女似乎从没有利用过什么关系给予特别的照顾。

□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自上世纪80年代始，出国留学风渐起。在清华，父辈为子女找找国外的老关系施以援手很常见。我曾问过父亲看看他是否可以帮帮我，没想到他却郑重地对我讲道：出国留学这件事上我不会帮你任何忙，你应当自己努力。当时听了这话我真的是很不理解。但是多年之后父亲这句“应当自己努力”始终在激励着我。

心中燃起的第二柱香是为了记住父亲给我的言传身教。

三

我是1959年出生，比姐姐小10岁。后来听母亲讲我出生前的小插曲，在父亲归国后母亲连着生了两个也就不打算要第三个了。1958年清华大学组织师生员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母亲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也报名参加了，由于强烈的妊娠反应被当成病号送回家，后经检查才发现是怀孕了。1959年初在我就要出生之际，邻居黄万里教授的太太丁玉隼派女儿黄肖路带话提醒父母：因为与上一次生我哥哥间隔了近十年，所以一定要到大医院去生产。父母对黄伯母的话非常重视，后来母亲去了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其妇产科主任为著名专家严仁英教授。这一次竟真的是难产并经历了大出血等难关，如果不是到大医院，后果不堪设想，父母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

虽有抄家、挂黑牌，但在“文革”中我们家在大小事上曾经得到过朋友和邻居的关心和帮助。在最乱的一天——“12校红卫兵血洗清华园”的1966年8月24日，有一队全副武装的红卫兵来到15公寓的门

前。母亲听到红卫兵砸开我们对面103号顾夏声教授家的门问道：这门洞里有谁家是黑帮？此时母亲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了，那可正是父亲挂着黑帮牌子的日子。然而她马上听到顾夏声教授缓缓地红卫兵讲这个门洞里并没有黑帮，红卫兵这才离开，悻悻然去了别的楼。对此父母也是一直念念不忘，经常讲如果不是顾夏声教授的帮助，哪怕是当时他有稍稍的犹豫，或当时首先砸了我们的家门，也许结局会是另外一样。在“文革”中，父母也是尽自己所能同时也要求我们去帮助其他落难的朋友。冯新德教授和太太被赶到北大边上的成府街中两间小黑屋内，母亲经常让我骑车到成府去看望他们，她还冒着风险帮助冯太太藏匿金银首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1967年我们家被迫搬到了面积较小的12公寓12号楼上，楼下住的是机械系主任李西山教授家。住在这里，我对两位邻居的目光忘不了。我们家搬入不久的一天，李西山教授的孙女袁红在12号二楼阳台向我介绍住11号的邻居是陈士骅教授，当时正好陈站在11号二楼阳台。就在袁红向我介绍时，他像听到了似地猛地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我对陈士骅教授犀利的目光印象深刻。此外还有另一个人的目光令我永难忘却，在12号二楼阳台上，我经常可以看到梁思成教授站在13号二楼阳台极目远望而且忧心忡忡。当时“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许多文物和古建筑都遭到无情的破坏，我想梁先生一定是为这事烦心而显得目光忧郁。不久后，李西山教授受迫害被赶出12公寓，搬到气象台边的小宿舍，父母让哥哥帮助搬家，搬家的那天机械系一个人也没有来，约定的另一（下转第8页）